

『
共
富
』

的
逻辑

CHONGQING MOSHI LILUN YANJIU

重庆模式理论研究



河南大學出版社

SWJUP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前 言

“共富”现已成为重庆施政的主旨，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更是提出了“不能拖、不能等”的指导思想。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正确抉择，而不仅仅只是体现某种伦理的诉求。在当前“共富”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甚至实业界共识的背景下，我时常回想起两年前我以《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为题的博士论文给我带来的些许“尴尬”，因为当时我从企业演化成长的基本规律的角度提出的“共富”经济逻辑是不太被审稿人、甚至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所接受的。有幸的是，这些许尴尬如今成为了我灰心和无助的动力。在那篇还很稚嫩的博士论文里，我想用尽可能规范的语言说明这样一些道理：经济发展虽然没有像物理学那样有规律的演变轨迹，但也不是无迹可寻的随机运动。其实，经济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为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而且，前者是关键性前提。我认为以人的发展权为皈依的经济发展模式决不会仅仅只是共产主义时代的专利，也不仅是纯粹伦理意义上的诉求，而是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也就是说，“共富”绝不仅仅只是伦理要求，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结果。我也不得不承认，在我高中时代起就开始阅读《资本论》《国富论》及《政治经济学原理》等著作至今，并由这些著作引我走入经济学殿堂之始，“公平至上，效率自在其中”的观点和社会治理理念似乎就在我的脑海之中扎下了根。我想“共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准确地讲，我不是一个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作者，1989年到1993年四年的大学生涯根本就与经济学无缘。记得当时在上海读大学时的一次湖南老乡聚会上，一个主修经济学专业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同乡自我介绍自己所学的专业时，不仅所有的老乡们只是发出没有任何意义的“哦”声以示回应以外，他自己显出的那种习以为常的“无奈”神色更是让人寻味。看来，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冷遇了。令我困惑的是，这种“无奈”如今似乎也开始伴随着我的经济学“研习生涯”。因为说到底，经济学本质上是某种带有“伦理”价值判断的思想体系，经济学给研究者带来的是“尴尬”“谩骂”，还是“财富”“地位”和“声誉”，完全取决于你的思想被当局或

者大众所接纳的程度。而我还远不是其中的幸运者，所以我总是受到“总也走不进经济学殿堂”的困扰。

在经济学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科学显学的今天，到底是我个人的尴尬还是经济学本身的尴尬，似乎还不得而知。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归宿。看来，确实到了要审慎思量我国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实际上，问题的本质还得回到“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上来。要厘定蕴含其中的经济学逻辑，我们还是先来看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演进逻辑。假如说我们都相信古典经济学的分工和规模经济是市场配置效率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则是市场效率波动的制度之源。显然，剩余价值如何在劳资双方配置，并以此最大化市场配置效率肯定是任何资本家、政治家和劳动者所共同追求的行为依据。进一步分析，劳资双方谈判力的相对大小又自然成为了其中最为核心的决定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劳资双方谈判力的相对大小呢？我的回答是市场的供求环境。人类社会从有市场开始，无疑经历了从供给者主导向需求者主导的市场环境转型过程。假如是这样的话，回答问题的思路就变得清晰了。假如处于供给者主导的市场环境中时，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思想”就会居于主流，资本回报的多寡无疑成为了决定市场配置效率大小的关键因素。反之，假如处于需求者主导的市场环境中时，由于技术创新将成为主导市场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本思想”将会居于主流地位，人力资本回报比例的多寡将成为决定市场配置效率大小的关键因素。由此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用于阐释资本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只是阶段性的表象经济学，而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经济社会最终走向的阐释。

由此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假如仅仅考虑市场配置效率的话，追求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公平既会成为效率的前提，更是效率追求的归宿。

进一步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到，假如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制度，特别是剩余价值分配制度优劣的评判标准的话，问题或许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全要素生产率是市场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分工也有性质完全不一样的组织内部分工与社会一般分工之分。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知道，经济活动合作水平的始作俑者是人力资源禀赋在某一项特定生产任务之中的相对互补性的程度。人力资源禀赋在一项特定的生产任务之

中互补性的相对大小就决定了组织与市场的边界。相对互补性程度越大,合作就越有可能采用行政组织的方式实施;反之,相对互补性程度越小,合作就越有可能采用市场组织的方式实施。从市场到不同规模的组织之间实际上就成为了没有明显边界的连续光谱。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采用行政方式组织生产更加便于不完全契约的履行,有利于互补性更强的人力资本之间就合作剩余分配问题达成可履行的契约。而市场方式组织生产更加便于完全契约的履行,有利于替代性更强的人力资本之间就比较优势的交换达成可履行的契约。利益的权衡决定了此两者的边界。这也可以视为企业与市场边界问题的一种新的解释。

追求人力资源替代性的比较优势是市场配置效率的推动力和归宿,它以规模收益和成本降低为主要手段;而追求人力资源互补性的合作优势则是另外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合作形式,并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直观的结论:组织内部分工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也是改变人力资本相对互补性程度的基本力量;市场机制则主要是技术效率(市场配置效率)的基本装置。此两者通过生产组织方式由行政方式(企业)不断裂变为市场方式推动着市场与分工水平的互动深化,决定着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动态。

值得注意的是,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生产组织方式由行政方式(企业)不断裂变为市场方式的直接推手就是人力资本在组织内部的谈判力配置状态。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适时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撤选择权可以推动内部分工水平,进而促使社会一般分工水平的深化。正所谓“公平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基于以上非主流的经济直觉,本书拟通过以下思路阐明“共富”逻辑的经济理性:

协调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深化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转型是任何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都必须直面的难题。而正确发挥政策诱导作用的前提是对企业运行的微观机制进行准确而富有意义地分析。因此,很有必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但建构直接与宏观经济表现相关联的、可实证的企业理论对中国经济转型却显得更为迫切,也更有理论价值。

以“交往”为分析的基本单位,仍然强调各种社会组织的契约性质,而企业的特性则在于它是要素所有者基于要素属性间“自然关系”的“私下谈判”的均衡,该均衡进一步型构为与所处环境耦合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企业制度/组织结构;而对更高合作水平的追求不仅促

进着社会一般分工和个别分工的深化，同时也是组织/制度发生和演进的动力所在；进而基于个别分工的、交换比较优势的市场与基于一般分工成长的异质的企业都只是由不同要素属性间“自然关系”所衍生出的不同“社会关系”而已，而合作水平的差异则是它们相异的基本维度，从而也阐释了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异质性的本质原因。因此，无论是市场、混合组织，还是极端的科层组织，它们都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企业的合作演化也因此可以很好地阐释企业的演化过程。

用以阐述“共富”的经济理性的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因此有以下几点：① 企业制度/组织结构都是合作博弈的均衡，它既是合作的前提，也是合作的结果；② 在既定技术、制度和市场等环境的综合作用下，要素所有者交往的利益与冲突状态决定了团队的合作水平，而交往的利益与冲突状态在根本上又是由要素属性间的“自然关系”，即互补性与替代性的相对程度所决定；③ 技术、制度和市场等环境的变迁改变了要素属性间互补性与替代性的相对程度、要素所有者交往的利益与冲突状态，进而交往的合作水平，并因此推动着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演化；④ 企业的演化本质上就是企业的合作演化；⑤ 立足于促进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制度、技术环境的建设才是协调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深化、促使企业的合作演化并最终推动全面技术进步和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这也是马克思“技术进步是为了劳动者的本身”观点的具体体现。

由于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阐释了“交往”这一分析单位的本质内涵，“自然关系”是基于技术的要素属性间的战略关系、要素所有者交往的利益与冲突状态并最终体现为某种程度的合作水平，而“社会关系”则是要素所有者基于既有的“自然关系”在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合作博弈的均衡解，并最终型构为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因此，“交往”完全将强调技术资源方面的新古典“交换”与强调契约方面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作为了它的两个方面，并因此可以实现企业的契约理论、能力理论与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初步融合。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借助“交往”这一基本分析单位将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个人策略选择、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与宏观经济运行四者之间动态演化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有望肩负起预测和解释宏观经济现象的理论基础这一任务。

本书分为十章。第一章是绪论，或者叫做引言。它主要是说明了本书写作的背景、前人研究的贡献及本书的写作目的。第二章到第四章以制度与互补性关系的分析为起点，建立了一个用以阐明“共富”经济逻辑的理

论框架，并以最新的数理分析工具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数理模型，很好的形式化了所建立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从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市场等不同组织的履约过程及治理结构的演变规律，借以证明本书建立的企业理论的合理性。第七章到第九章分别从这个企业治理机构的变化过程、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过程及西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优势等三个方面应用并验证了本书所建立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证明了“共富”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基础性地位。

本书的逻辑演绎过程为：

首先在内生分工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协调成本内生，并以此形式化了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其次在技术、市场和制度演化环境中分别考察企业的合作演化规律。当我们将企业看做要素使用权交易的履约过程以考察企业产生、发展和演化中的合作问题时，发现随机竞价阶段要素属性的互补性与替代性相对程度越低，要素所有者实施专有性投资的激励就越高，但在“根本转换”之后的“私人秩序”下，要素所有者反而更有激励投资于那些互补性与替代性相对程度越高的资产，从而更高合作水平的企业具有明显的演化优势。而当把企业看做是谈判力配置相异的治理结构并在竞争演化时，我们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即谈判力更加制衡的治理结构在任何市场环境中都具有演化优势。再次，通过考察中国企业的演化现象验证了理论预测，即中国企业显现的是非合作演化过程，并通过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的非合作与合作演化分化的临界条件和开放条件下对企业既有演化路径的强化效应。因此，适时协调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权的相对实现程度是保证企业以内部分工方式增长的关键前提，经济转型也因此才能实现。最后还就如何协调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深化以促进企业的合作演化、全面技术进步和实现经济转型提出了政策建议。

最后要说的是，不论我的理论研究、模型演绎是否缜密，我还是非常庆幸来到了重庆。因为我坚信内陆必须坚持与沿海完全不同的开放模式才可以沿着可持续的路径发展经济。而富有智慧的重庆人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也正朝着这个方向收获着“半条微笑曲线”带来的良好的开放效率。虽然这也是本书的主要推论之一，但我更为重庆人的这种理论直觉而自豪，也为我的另类经济学思考而倍感庆幸。

本质上讲，“共富”的逻辑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而不是任何程度上的伦理要求使然。细究起来这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命题。因为每次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都将会改变既有利益的分配格局，而市场机制的短视性也将与

之一起阻碍着人们对长远利益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富”逻辑又是一定程度的伦理要求的体现。因此，重庆市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不能等、不能拖”的指导思想无疑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上的先行先试，意义不可谓不大。

我要告诉那些有可能看到这本书的朋友们：本书思想并没有完全遵循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撰写，它只不过将经济学思想史中采集到的一颗颗明珠串起来了而已。所以，游弋于经济学殿堂外想更快收获成功的学者们可能要失望了。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就请翻阅本书的前言吧，它将带领你将你的目光更多地投向重庆这块热土地，获得从真实世界中采撷到朴实的成功的喜悦。

杨 勇

2011年9月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不确定性、合作机制与企业理论的演进：理论综述	5
第 2 章	互补性与制度变迁	39
2.1	互补性的界定	41
2.2	互补性的根源及其演化	42
2.3	互补性的测度	44
2.4	互补性的微观测度：对现有互补性理论的拓展	46
2.5	互补性与制度变迁	48
第 3 章	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分析框架	51
3.1	交往	54
3.2	交往、合作与经济组织内生	64
3.3	企业的合作及其内在机理	77
3.4	企业的合作演化及其机制	91
3.5	简短的结论	100
第 4 章	协调成本内生的企业合作演化模型	101
4.1	模型背景与假设	102
4.2	企业分工内生化增长中的合作演化	105
4.3	简短的结论	110
第 5 章	企业成长中的合作演化：对履约过程的考察	111
5.1	要素使有权交易的履约过程	112
5.2	履约过程的建模思路	113
5.3	履约的过程模型	115
5.4	分成惯例及合作水平的经验研究	133
5.5	结论	151

第 6 章 企业在市场中的合作演化：对治理结构的考察	152
6.1 引言	152
6.2 古诺竞争方式的设定	155
6.3 考虑谈判力的企业竞争行为	156
6.4 不同市场情形下治理结构的演化	157
6.5 结论	164
第 7 章 应用：中国企业	166
7.1 中国企业的非合作演化与生产效率绝对下降	167
7.2 企业合作演化与非合作演化分化的技术条件	172
7.3 开放背景对中国企业非合作演化的强化效应	181
7.4 结论	185
第 8 章 应用：中国生产率	187
8.1 引言	187
8.2 模型推导	188
8.3 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191
8.4 结论	197
第 9 章 应用：西部转型优势	199
9.1 引言	199
9.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202
9.3 实证结果分析	203
9.4 经济增长趋同性分析	210
9.5 结论	212
第 10 章 促进“共富”的制度环境设计	213
10.1 促进企业内职工合作演化的政策取向	214
10.2 硬件基础设施与人的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	217
10.3 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体系	219
结论	224
参考文献	228
后记	243

第1章 绪论

[劳动市场]……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一旦离开这个领域[而进入工厂]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①

我们记得,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在无所谓谁雇佣谁;即使劳动雇佣资本也可以。

——保罗·萨缪尔森,《工资与利息》,(1957)^②

1.1 问题的提出

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现实条件下,各类企业组织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对它的考察也成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前提。令人尴尬的是,虽然关于企业到底为何物、谁拥有它、谁管理它,如何被管理和被组织以及如何演变等问题有着汗牛充栋的文献,但分歧要远远超过共识。

1.1.1 理论层面

科斯范式的“市场—企业”二分法和威廉姆森的“市场—混合组织—企业”三分法由于都没有研究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型构过程等与组织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因此多被称为“企业的边界理论”^[1]。为进一步丰富对企业问题的研究,Cyert 和 March (1963) 在《企业行为理论》中将企业定义为描述企业决策过程的一些惯例性模型^[2],力图对研究范围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7(1),204-205。

^② 出自萨缪尔森(1957,894)。

进行拓展。Holmstrom 和 Tirole (1989)^[3]则从“企业—市场”二分法为起点讨论了企业的资本结构、科层以及其他有关企业的组织经济学问题。Holmstrom 和 Roberts (1998) 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拓展了科斯范式,并回答了寻租理论和产权理论未能考察的一些理论和经验问题^[4]。为寻找到企业行为的物质基础,资源 (Penrose, 1959; Wernerfelt, 1984)、惯例 (如 Nelson、Winter, 1982; Henderson、Clark, 1990) 和知识 (如 Kougut、Zander, 1992; Nonaka、Takeuchi, 1995)^[5]等也逐步成为企业理论的研究范畴,并成就了彼此不同的分析框架。理论的可实证性是重要的,因此 Whinston (2003) 对“制造还是购买”问题进行了经典的实证工作^[6],从而开创了建构可以实证的企业理论之先河。在这条理论道路上前进的还有年轻的北大学者柯荣住,他将契约理论与统计推断相联系,并因此建立了一种计量方法来识别最优契约。他试图建立可实证的企业理论的力作,但因为未涉及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产生和演化问题而留有遗憾。

1.1.2 实践层面

2009 年 1 月 2 日,某记者撰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两方面。一方面,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突显;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此外,消费和投资不协调,内外需求不协调,一、二、三产业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协调等“软肋”,同样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7]。因此,中国经济“速度”与“结构”严重失调是所有问题的集中表现。虽然人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期望提高公司效率,如伦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司治理改革委员会的 Cadbury 报告就提出了上市公司董事会应该遵循的最佳行为准则;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分别于 1998 年和 2005 年制定了《公司治理原则》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南》,用以为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提供指导;我国也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但现实依然令人遗憾。例如,银广夏、琼民源、红光实业、蓝田股份,还有当今奶制品行业的“龙头”,如蒙牛、伊利、三鹿,似乎也成了“昨日黄花”;管理权的争夺使宏智科技净资产收益率从 2001 年上市时的 25.3%下降到 2003 年年底的-23.4%,每股净收益率从 2001 年上半年的 0.434 元下降到

2003年的-0.839元^[8]；ST丰华由于大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占用巨额资金而连续三年亏损，2004年6月被暂停上市^[9]。

学术界的尴尬是因为企业理论未能提供正确解释和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特别是在企业性质及其演化等基本问题上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能够解释实际现象的理论^[10]。我们认为“分析单位”是直接体现理论进步的标准，唯有此，理论才可以“用适当的语言和概念工具来实实在在和有意义地描述哪怕是一个简单的组织，亦即用一种可以科学地分析其结构和运作的有效性提供基础的方式来描述它”^[11]。“交易”相对“交换”只是发现了制度的重要性，而不能解释和分析其结构和运作的有效性。虽然基于演化的资源、知识、能力与惯例等分析单位体现了理论积极适应时代的进步，但仍未找到可以恰当地将个人策略、组织行为与宏观经济运行相联系，特别是制度/结构与其赖以产生和演化的物质基础相联系的方法。因为任何宏观政策、制度环境等均只能通过改变个人的策略性行为来间接影响企业制度及其变迁，并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所以尽可能准确理解企业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规律是正确解读宏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一个可以直面现象的企业理论就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基于此，本书试图从“交往”概念入手，论证企业内生于人类交往的某种结构，其演化也因此表现为合作的演化这一核心命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① 企业是为要素所有者提供合作交往的组织结构/企业制度；② 交往中的不同利益与冲突状态以及因此被决定的合作水平是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异质性的根本原因；③ 一般分工的深化体现了要素所有者对更高生产效率的追求，并因此推动着企业的合作演化；④ 最大化的要素所有者总是将规模扩张到边际要素所有者的合作策略的期望收益与其非合作策略的期望收益相等的位置，企业的合作水平及其规模也因此被决定；⑤ 边际要素所有者的期望收益一般等于他的回撤选择权；⑥ 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因此都是既定环境下的合作解；⑦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决定博弈支付结构，并以此促进企业的演化路径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等可被观测到的表现。

虽然有文献表明企业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合作制度，但并没有研究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产生、演化的机制和过程，而且对那些带有人为设计思想的概念，如“治理”（Williamson）、“混合治理”（Barzel, 2002, 2006）的效率问题投入太多。正如 Aoki Masahiko（2002）所指出的，根据新古典的逻辑，如风险分担、数量机制和监督等，雇佣双方是可以合作获得好处的。因此，企业也应该有隐含企业特质性资源所有者进行谈判的这

样一个隐形过程,而不仅仅被视为一些个人交易关系以及一些可出售的剩余索取权^[12]。显然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也会存在一个隐形的谈判过程,因为奴隶主事实上还是给予了奴隶维持自身繁衍必需物质以外的收益。而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体现的是要素所有者的交往关系,特定的利益与冲突状态在合作博弈框架中的均衡必然型构成某种特定的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因而企业不是剩余最大化组织。但 Aoki Masahiko 只是讨论静态的企业合作问题。另外,国内学者,如黄桂田和李正全(2002)、杨晓维(2000)、杨瑞龙和杨其静(2000, 2001)、谢德仁(2002)、李维安和王世权(2007)、刘长庚(2003)、王金柱(2005)和陈赤平(2006)等,已经注意到企业制度是相关利益人博弈的均衡解,甚至也强调了企业制度的内生性,并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最优的企业制度安排。但这些文献并没有解决如下关键问题:决定要素所有者遵循某种“私人秩序”以实施合作行为的最初动因是什么;“私人秩序”是如何型构和演化的。总之,由于没有考虑企业及其行为得以形成的最初动因和演化机制、动力等问题,因此这些文献也就没有成功地演绎出企业演化本质规律性,大部分还只是规范性分析。

本书正是基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不协调的现状长期得不到扭转这一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引入“交往”这一基本分析单位,建构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分析框架以解释企业发生、演化的基本规律及其机制,并期望能够对我国宏观经济速度与质量失衡的“顽疾”给出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对交往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即“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决定性以及分别与要素所有者的战略关系和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之间的逻辑联系的分析,建立了能够解释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策略选择来影响企业的组织行为,并最终建立了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企业合作演化分析框架。该框架要证明的核心命题,即企业的演化在本质上是合作的演化过程。为此,首先,本书在要素使用权交易的履约过程中考察了企业产生和演进的规律;其次,在不同市场环境中考察了不同合作水平的治理结构的演化规律;最后,为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合作演化的决定性,通过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合作演化规律及其决定性,这既是理论的应用,也是理论的进一步论证。

针对上述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速度与质量之争,本书提出了以下命题: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背景下,投资、消费(内需)和出口虽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只有从根本上走“扩大内需”之路才是协调速度与质量的根本举措。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家必然不能从根本上协调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深化之间的矛盾。假如人力资本收益权长期得不

到完整实现,必然会阻碍社会分工深化的速度,进而导致技术进步迟缓、生产效率低下,并最终使企业卷入非合作演化之路。因此,关注民生的“扩内需”不仅仅是短期经济增长效应,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企业演化路径以实现经济转型。由此得出基本结论:在尊重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内生的前提下,一国必须能够制定适应发展阶段的政策并以此创造合适的技术和市场等环境,通过科学配置要素所有者谈判能力结构来促进企业的合作演化和经济适时转型。

因此,本研究无疑为考察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开放背景下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合理配置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以及促进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例如,长期以来我国遵循“先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忽视了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内生性,如何适时适量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为出发点实现经济转型,将成为我国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一个基本政策导向。正如本书研究所指出的,适时调整劳动法及其相应的实施细则、适时适量地推行和调整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适时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居民国民待遇等政策,都将实质性地影响要素所有者博弈的支付结构,并决定了企业合作或非合作的演化路径。

因此,企业的合作演化理论必然可以肩负起预测、解释并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任务,尽管解释企业的角度是多维的,但至少这一点更为重要。

1.2 不确定性、合作机制与企业理论的演进:理论综述

1.2.1 理论发展概述

奈特 1921 年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开启了组织经济学的大门,但后来学者对不确定性的不同理解使得企业理论分化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下的企业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下的企业理论两类迥然不同的理论系统。前者认为,不确定性是因为必要信息成本约束了企业的最优化决策行为;后者则认为,不确定性来源于企业缺乏必要的知识对事件本身及其未来可能的状态作出正确的判断。简而言之,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不确定性是因为决策者

面临着最大化决策时的成本约束,而且这种成本在很多时候可能是禁止性,因此表现为参数不确定性;演化经济学理论认为,不确定性源于人类知识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可以将之归类于结构不确定性。

具体地,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交易成本概念否认了结构不确定性的存在,从而将经济协调的效率问题转化为信息成本约束下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最优选择问题,并最终在新古典框架内完成了对企业性质的解释。正如 Williamson 所指出的,不同交易的特征及其相应的成本是决定不同治理形式(市场和企业)相互替代的决定因素。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同的是,演化经济学关注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选择的决定性,因此企业的知识、能力和资源的异质性是解释不确定条件下企业竞争行为的基础。而纳尔逊和温特(1982)认为企业知识、能力和累积性资源等在演化中建构为特定的企业惯例,而对企业惯例的搜寻、模仿和试错则构成了企业演化的基本力量。Alchian (1950)也指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组织活动具有更重要的经济协调作用,而且企业发挥协调作用的基础是对现实中成功企业的模仿以及自身的一些创造性竞争行为^[13]。

虽然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区别,但在有限理性的存在性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完善各自的理论逻辑,对有限理性的处理方式也相应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例如,Williamson (1991)在含蓄承认最优化决策与有限理性之间的逻辑矛盾的基础上,试图引入“洞察力”的概念,从而在演化框架中修正这一缺陷。由于任何经济个体事前就被赋予学习、预测未来和预想威胁等方面的能力,人们总是依靠“启发式”思维解决复杂问题,即所谓的“洞察力”。“洞察力”与有限理性的结合排除了决策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体可以对交易的组织方式进行不懈的边际分析。而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无理性假定也存在逻辑问题,因为探索性的“模仿”和“试错”行为缺乏对未来结果的完全认识,实际上不断变化的环境往往使得个体对结果比较、甄别和选择的可能性非常小,尤其是在动态环境中,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会存在。因此,无论从参数不确定性出发的交易成本理论,还是从结构不确定性出发的演化理论,均存在着理论上的不彻底性。虽然 Williamson 和 Alchian 提出了问题,即从不确定性出发认为对社会经济的协调过程是重要的,提出了企业等微观经济组织的行为对经济演进的重要意义,但并没有描述经济个体、组织行为与宏观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即“尘埃是如何落定的”^[14]并没有得到解释。

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论作为组织经济学研究工具,对探讨“尘埃是如何落定的”这一过程及其机制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我们可以暂且不去探究认识论上的分歧,因为无论不确定性是如何产生的,不懈探寻企业最优化决策的演进机制才是更重要的理论任务。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促使我们将目光投向“合作机制”的研究。同时,从事组织/制度研究的学者也分化为三个流派:①以 Ronald Coase、Douglass North、Armen A. Aichian、Harold Demsetz、Oliver E. Williamson、Yoram Barzel 以及张五常教授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②以 Kenneth Arrow、Frank Hahn、Jurg Niehans 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流派”,他们试图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考虑交易费用的影响;③以 Andrew Schotter、Robert Sugden、H. Peyton Young、Avner Greif、Masahiko Aoki、John Harsanyi、Kenneth Binmore 等为代表的“制度内生学派”,他们使用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方法对制度的发生、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15]。

例如,制度内生学派中的 Masahiko Aoki,使用博弈论方法建立了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将企业看做股东和雇员形成的联盟,共同成为企业特质性资源的贡献者,并共同分享由企业特质性资源产生的组织租。企业管理政策和组织租分成比例,即企业制度均通过合作博弈机制达到组织均衡,“假设谈判一方以撤出合作博弈作为有力的威胁,没有任何一方期望在破坏合作的同时,又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效用的增进(就是组织均衡)。组织均衡的实现,一般要求在制定管理政策的同时,确定组织租的内部分配状况。在市场条件和企业特质性资源存量既定的情况下,对管理政策的阐述,实际上解释了不同时期组织租的内部分配状况”^[16]。在此基础上, Masahiko Aoki 试图揭示合作博弈模型可以作为一个普遍的解释性框架,来分析不同制度框架下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效率特征^[17]。该理论不仅通过程式化“尘埃是如何落定的”机制为研究企业制度的型构作出了方法论的贡献,并将个人策略、组织行为与宏观经济表现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他首先认识到了企业是一种提供合作机制的组织并将其模型化。由于在逻辑上强调只有企业特质性资源贡献者才能为分享组织租进行合作博弈,因此他认为,工会制度引起的工资刚性会导致失业,而雇员层级制也会导致企业增长速度变慢,从而将工会制度和雇员层级制归结为两种无效率的谈判情形。但对于青木昌彦的合作博弈机制,目前还存在分歧。

除了国外学者,我国也有许多学者为阐述和深化企业的合作机制进行了大量的规范研究。例如,结合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人力资本不可压榨的思

想,周其仁指出那些消极的物质资本向来都是掌握在那些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的手中,这一观点显然来源于 Masahiko Aoki “企业特质性资源贡献者”的思想;随后,杨瑞龙和周业安在借鉴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于国外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平等产权主体。因为企业中不仅物质资本的投资者承担了风险,而且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企业参与者也投入了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因此也应该参与企业管理并分享组织租金,即最优的治理结构应该是允许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企业制度^[18]。除此以外,湘潭大学的刘长庚、王金柱和陈赤平等也通过建立双产权、联合产权等概念试图对建构企业的合作机制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纳尔逊和温特(1982)认为企业的知识、能力和累积性资源均型构为企业惯例,企业的演化也因此成为企业惯例的演化。惯例合作博弈的结果,又是合作博弈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讲,纳尔逊和温特触及了合作及其演化机制的本质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对此具体分析。

关于内生组织的效率问题,自 20 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Economic Biology)开始,无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都试图利用经济选择机制在演化框架中解释不确定性条件下有限理性与边际计算之间的可协调性。凡勃伦和马歇尔都认为,虽然很多就其本身而言对人类种族并无优势的习惯会保存下来,但从长期来看,只有拥有最好的习惯并能够得到发展的那些种族才能存活下来,因此,尽管“均衡”暗示了一个静态的类比,但实际上它是动态分析的一部分。马歇尔也因此认为,(经济学)始终是研究导致运动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19]。在演化框架下论证边际计算与有限理性的协调性的学者还有 Machlup、Alchian、Friedman、Becker. G. S. 等。例如,Williamson 认为,可以用流行的组织形式所获得的效率来解释它们成功的原因,即这些组织形式被假定是在与其他不同的组织形式的竞争中证明了其效率,因而才能够流行起来^[20]。后来的 Jensen (1976, 1983)、Meckling (1976)、Fama (1980, 1983) 以及 Demsetz (1967, 1988, 1991) 等都一致认为:只要保证市场的竞争性,市场的压力可以使得代理人被观察到的行为就是最接近“边际计算”的行为。虽然如此,仍然没有完整地研究从个人决策到组织行为的机制,更不要说去试图构建它。有意义的是,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流派通过在方法上的创新,为这些存有大量分歧的企业理论在合作机制下得以整合提供了契机。接下来,我们将较为系统地综述企业理论从分化到整合